城市 周刊 WEEKLY

梦想家园，你我同行

随意之间现文明

我为城市支一招

公园里，赏玩的市民随意折取一支开放正艳的花枝；繁华的大街上，有的市民一边吃着水果，一边无视垃圾桶的存在，把果皮随意丢在地上；广场上，有的人把擦鼻涕的卫生纸随意乱扔……这些随意之间，体现的是素养，损害的是文明。

人是文明城市创建的主体，说到底，除了一些必要的硬件设施外，文明城市创建关键是日常生活中人的文明素质的培养，只有让广大市民树立“城市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的思想理念，像爱护家庭一样爱护生活的这座城市，市民才能真正视自己为城市的主人，极力维护城市文明。

如何提高市民文明素养，让他们不当看客当主人，以笔者之见：要发表告市民的城市文明创建公开信，申明文明城市创建的目的和意义，并利用多种场合与广大市民签订文明公约；让新闻媒体成为城市文明创建的“推动者”“督察员”；开办“市民文明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社区讲解日常文明礼仪；开展活动促进文明城市创建，如开展“文明社区”“文明机关”“文明市民”“文明标兵”等评选表彰活动，让大家见贤思齐。

（河南正阳　陈　健）

成长坐标

污水横流变水清岸绿

近年来，山东青岛市采取截污、清淤、监测等方式治理河流，使多条河流重获新生。李村河是青岛李沧区的一条主要河流，2009年开始，李沧区对李村河的上游河道分三期进行综合整治。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治理技术，实现城市生态功能的系统性修复。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改造前的李村河上游周边为自然村庄聚集区，河水污染严重，环境脏乱差。

改造后的李村河水清岸绿，7座景观桥、2个湿地景观将其打造成高品位的城市生态公园。

结合城市建设的功能需求，李村河沿岸设有健身场地、亲水平台、自然溪流等，最大限度丰富周边居民的生活。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银川首推“完整版”城市互联网医院体系——

让百姓不再千里求名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拓兆兵

经纬

在医疗资源汇集的大城市，你可能对互联网医院的便利感觉不深，但是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市中，智慧医疗是将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放大，它的出现可能会挽救一个个家庭。

经过多年智慧城市的试点，银川在国内率先推出城市智慧医疗的体系平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3月19日，“春雨医生”、“北大医信”等15家互联网医疗企业与银川市政府签约，正式获得互联网医院资质，进驻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基地。至此，加上之前入驻的“好大夫”、“微医”，银川市的互联网医院已达到17家。同时，银川还出台了若干扶持互联网医院的政策，成为国内第一个关于互联网医院管理较为完整的系统监管体系。

以大数据、“互联网+”新技术为依托，银川建成了国内首个互联网医院产业基地，为国内城市“互联网+医疗”的推进进行了有益尝试。

在家门口看上病少花钱

家住银川市的夏天天出生10天，皮肤就出现凸起，还是红色，医生诊断是患上了血管瘤。经过各种治疗，6个月后情况没有明显好转，医生建议到北上广的大医院去看看。而听说了银川互联网医院能对接到权威专家来银川做手术，夏天天的父亲就试了试，竟真的联系上擅长诊治血管瘤的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主任医师郑家伟，并完成了在线诊断。

夏天天的父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到上海10天的就医成本来算，两个人飞机到上海往返最少要6000元，住宿费3000元，餐饮费1000元，再算上误工费1500元，至少要花11500元，还不包括挂黄牛号的费用等。

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平台监测的数据显示，平台运行3个月以来服务银川地区的患者数达5221人，其中仅北京、上海两地的专家，就服务了1050名银川患者。在线就诊的疾病约10%是复杂、疑难疾病。

那么，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到底节约了多少看病费用？“好大夫在线”CEO王航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2016年人均诊疗费用估算，仅这1050名患者在医疗费用上就至少节约了1000多万元，而在交通、食宿、误工等非医疗费用上，还节约了700万元以上。

根据2016年出版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综合公立医院门诊病人单次诊疗费用200到300元之间，其中近一半是药费。而在互联网医院平台，单次平均诊疗费用不足100元。

“看病难、看病贵是医疗行业供给不足的表现，看病难显示出医疗资源供需整体上还存在较大缺口，看病贵除了存在因短缺而形成垄断收费因素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而增加的非医疗费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病人到北上广大医院寻医治疗的费用中，吃住行等非医疗费用占整体费用30%到50%左右。”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指出，互联网医院的出现可以有效缓解这个问题，北上广等地医生加入互联网医院进行多点执业，等于整合这些医生的碎片时间，再造了2到3倍量的医生资源，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同时，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通过信息技术下沉到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中西部地区，方便了当地居民，也省去诊疗、治疗过程中的非医疗费用。

为阳光收入开辟通道

今年1月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可通过兼职兼薪等措施，提高医护人员待遇。而“互联网+”平台能将医生的碎片时间集约利用，无疑成了医护人员理想的“兼职加薪”渠道。

据了解，目前我国批复了36家互联网医院，建成的有25家，真正运行的只有10多家。不少互联网医院以网上挂号、互联网医院值班室、医疗平台与实体医院结合的形式开展服务，效果并不理想。而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为医护人员获得更多合法收入开辟了通道。“好大夫在线”的公开资料显示，在线执医最高可为医生带来每月14万元的阳光收入。新推出不久的“家庭医生”服务，最高也能给一个主治医师带来每月4.8万元的阳光收入。

医生在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的收入，受服务患者数、医生收费标准等影响。据了解，平台上有医生全年服务患者总数最多达到1.7万人。2016年，在“好大夫在线”平台上，收入最高的医生是北京一名皮肤性病科医生，年收入1134895元，成为2016年平台上的“百万医生”。

“由此可见，群众还是愿意为优质医疗资源支付诊断费用的。下一步，银川市卫计委将协同市发改委等部门出台扶持第三方检查中心、治疗（手术）中心、康复保健中心等配套机构建设政策，打造互联网医院的生态链。”银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田永华说。

在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医生通过在线诊疗、家庭医生、疾病咨询等服务，把劳动兑现成了阳光收入。运行3个月，注册“好大夫在线”平台的医生数量也增加了6866人。实践表明，医生的阳光收入在增加，患者支出却在减少。

今年4月1日起，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将开始执行，医生跨区域多点执业注册得到开放。这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让互联网医院吸引更多的优势医疗资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计委主任马秀珍介绍说，“以银川市为例，我们对线上医师实行跨省备案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把主治医师持证5年以上，以及执业范围和科室标准关口，先后为11000余名互联网医院的医师审批备案，并将备案医师的执业资质信息通过互联网医院官网平台向全社会公示”。

引领医疗体制改革

2016年初，银川率先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将3大类78项审批事项实施“审批改备案”，为银川开展“互联网+医疗”探索打下了基础。2016年12月10日，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正式启动。在网上诊室里，患者可以像使用微信一样，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不同形式和医生交流，主诊的医生还可以呼叫合作的医生，为患者会诊。“互联网+医疗”的方式帮助银川全面开启了智慧医疗服务。

据介绍，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成功运行3个月来，经过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成功的医生人数达到1.1万人，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82%来自三甲医院，三级以上医院总计占92%；开通在线执医的医生中，88%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职称。总服务患者人数达到92万人次。

这两年，银川市制定了《互联网医院促进办法（试行）》等6项管理和扶持互联网医院的政策。田永华介绍说，这套互联网医院发展管理政策，明确了互联网医院与协议医疗机构、零售药店之间的电子处方互认、安全性以及建立互联网医院执业医师准入、评级及退出机制。此外，银川还将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设立互联网医院终端窗口，实现互联网医院全覆盖，方便老百姓看病就医。

互联网医院作为新兴事物，是一个监管难的“真空地带”。银川市把所有互联网医院的服务器放在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同时向监管部门开放端口，服务全过程的数据以及患者的健康档案数据，全部存储在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川介绍说，互联网医院上每一次的健康咨询、问诊、处方、医药电商、会诊、复诊等一系列医疗行为，都留有痕迹，监管部门随时可以抽查。

中兴（银川）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巩远波认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是靠国家投入，培养更多医生，打造出更好的医疗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二是要靠体制机制改革、新技术的应用，释放出更多的潜力，提高供给能力，就像包产到户激发农民积极性一样。

“未来，我们更看重银川大数据裂变所带来的前景。因为这些互联网医院虽然注册在银川，但它们的业务面向全国，产生的数据是全国性的。这些数据裂变出的价值不可估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银川会出现像IBM Watson似的智能机器人医生，这些医疗数据的挖掘会辐射医疗、制药、健康、养老、会展等产业。”巩远波说。

城市工作“一头沉”该变变了

张　毅

城之道

当前我国城市行政部门的工作流程设计大多停滞在“管理”而非“治理”层面，这种“一头沉”的治理格局导致行政主管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在应对庞大、复杂、随机动态的城市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

不久前，一场市民电视问政活动甫一结束，西安市户县环保局领导班子被集体免职。如此“重手”令笔者思考良多。“环境治理不力”，当事环保部门官员自然责无旁贷；治庸治懒，上级组织部门施以雷霆手段，当然也是用心良苦。然而，作为当天亲身参与问政活动的市民代表之一，笔者更关心的是，各方如何更加理性剖析问题背后的成因并施以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之策，而不是以摘了谁的乌纱帽作为终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治理效能低下与市民群体日益提高的公共环境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西安自去年以来共举办过7次市民电视问政活动，内容涉及城管、住房、卫计等民生关切领域，统计数据显示，每一次的市民满意率均不足四成。

市民不满意，城市行政主管部门当然难辞其咎。但如果仔细分析思考，你会发现，除了城市相关部门作风慵懒导致的不作为、慢作为外，其实有相当部分问题出在“不善为”。也就是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比如，有市民代表现场质问环保局领导：记者能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这样的质询看似有理，环保部门也只能频频以“马上整改”而应对。其实仔细想想，上述的质疑和答疑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仅以环境治理的手段和人力而言，数据显示，西安环保系统总计不过1078人，对一个逾千万人口，总面积近万平方公里的大城市而言，环保部门即使每天24小时全员扫街，一个环保干部也要负责照应10平方公里。笔者无意为环保部门的工作不力开脱，但我国当前城市治理体系的确有改革提升的空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所谓的“马上整改”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当下城市治理成效与市民群众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问题表现为效能低下。其中以“发现”机制低效最为突出。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的环境治理基本停滞在两条传统的发现渠道：一是政府的主动监督抽查，二是涉事群众投诉。前者覆盖、落实能力有限；后者渠道不畅，响应缓慢。

上述短板的背后，其实全都指向一个治理机制上的症结，即依赖行政管理的过度“一元化”现象。而鼓励、引导市民群众主动参与的“共治共享”理念和制度安排严重缺失。

城市因人的聚集、互动而诞生，城市是承载经济、社会、生态、人情活动的一个动态、随机而有弹性的“会呼吸”的多元系统。但是，当前我国城市行政部门的工作流程设计大多停滞在“管理”而非“治理”层面，极其有限的市民参与机制大多流于形式，比如某些听证会等。长此以往，市民参与治理的能力、素养和社会治理组织也逐渐呈现严重的发育不良。这种“一头沉”的治理格局必然导致行政主管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在应对庞大、复杂、随机动态的城市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当一座城市所有的治理权力、义务全部集中于行政部门，所有问题都等靠行政部门出手管理时，其治理效能可想而知。以城市环境治理的发现机制而言，试想，如果城市环保部门能够积极善意地鼓励、利用社会大众力量，尤其是鼓励、发挥一些专业环保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媒体机构的作用，那么，那种媒体可以发现的问题，环保部门必然不会一问三不知。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聚促进城市发展正能量”。这样的政策导向，其实已经为城市治理改革创新标定了路线图。现在需要的，正是创新的手段和行动。